



南 / 方 / 语 / 言 / 学 / 丛 / 书

甘于恩 主编

方言研究集稿

伍 巍 著



暨南大學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南/方/语/言/学/丛/书

甘于恩 主编

方言研究集稿

伍 巍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方言研究集稿/伍巍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0.12

(南方语言学丛书)

ISBN 978 - 7 - 81135 - 687 - 8

I. ①方… II. ①伍… III. ①汉语方言—方言研究—文集 IV. ①H1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5212 号

出版发行：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510630

网 址：<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5

字 数：365 千

版 次：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12 月第 1 次

定 价：38.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总序

2008年5月，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被批准为广东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这既是莫大的荣誉，又是一种考验。中心全体研究人员皆深感责任重大，在各方有力的支援下，克服重重困难，竭尽全力开展科研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2009年，《南方语言学》（第一辑）诞生了，她为省内外语言学者交流学术成果搭建了一个极佳的平台。该书出版不久，即告售罄。这说明《南方语言学》的出版不但非常及时，而且十分必要。

然而，《南方语言学》的容量毕竟有限，她要面向广大语言学者，不能只容纳、发表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的学术成果。为了全面检视中心近年来的研究成果，经过充分酝酿，我们决定编纂“南方语言学丛书”。本次推出的是第一系列，以岭南方言研究为重点，包括以下七种：

- 甘于恩《广东四邑方言语法研究》
- 伍巍《方言研究集稿》
- 范俊军《语言调查语料记录与立档规范》
- 彭小川《广州话助词研究》
- 陈晓锦、翁泽文《粤语西翼考察——广西贵港粤语之个案研究》
- 刘新中《广东、海南闽语若干问题的比较研究》
- 钟奇《汉语方言的重音模式》

第一系列出版后还将征集相关研究成果，陆续推出第二系列、第三系列等。我们既重视基地骨干研究人员成果的整理与出版，也欢迎兼职研究人员提交成熟的研究成果与读者分享。我们衷心希望汉语方言研究中心真正成为团结、整合南方方言研究力量的一方园地，不断推动语言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深入开展。

广东社会氛围宽松，语言丰富复杂，学术思想活跃，经济蓬勃发展，这些都是广东省语言学繁荣的重要条件。汉语方言研究中心现已成为广东省人文社科的重点研究基地，并获得了省里及各方的有力支持。如此良好的学术环境，请诸君勿负之！让我们加倍珍惜，共同努力吧，广东方言学乃至语言学事业一定可以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最后，欢迎读者朋友对“南方语言学丛书”的编纂、出版提出宝贵意见，使它成为南方语言学的一个闪亮品牌。

甘于恩
2010年7月8日深夜草于方言调查途中

自序

第一次接触语言学是1979年我入北京中央普通话研究班。这是“文革”后的第一期普通话班，徐世荣先生主讲普通话课程，文改会的高景成先生讲授文字、音韵，周殿福、宋学先生教习国际音标，吕叔湘、周有光、倪海曙、郑林曦等先生分别为该班开设讲座。短短5个月的时间激发了我对语言学的兴趣。

1981年暑期，我有幸就学于中国语言学会在福建建瓯开办的方言学研究班，黄典诚先生主讲音韵，李如龙、黄家教、王福堂、徐宝华先生教授汉语方言。期末在老师指导下做闽中方言调查，引我正式走上方言学之路。为进一步充实自己，同年下半年我入读严学容先生在武汉开办的首期音韵学研究班，此后跟随社科院语言所郑张尚芳先生在皖南方言区先后做了3年的调查实习，每天接受他的音韵考查与听记音训练，从此与方言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1年，蒙恩师詹伯慧先生不弃，允我请业于先生门下，攻读他的首届方言学博士研究生，第二学年先生即领我们开赴广东的北江、西江流域各县进行粤语实地调查。坦白地说，当时我还听不懂广州话，要独立地对付北江、西江的地方粤语，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正是这一“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锻炼，使我这个已逾不惑之年的“老学生”掌握了粤语。从此我得到了一片崭新的空间，原来南方方言的内涵如此丰富，不但过去所学过的音韵学知识在这片土地上能找到鲜活的样本，以前我找不到答案的相关词汇、语法问题也能在这片空间里得到启示，使我在认知上得到升华：语音是方言研究的首要基本功，但方言研究并不局限于语音，词汇、语法同样是方言学不可或缺的研究内容；方言词汇与语法研究也绝对离不开语音表征的判断，因为方言土语并不依赖于文字形式而存在。方言研究不但要客观、准确地描写事实，而且需要对事实进行合理的分析与解释。我对汉语词汇与语法问题的某些见解也完全得益于方言事实的支撑。

方言学科近似于自然科学，任何一个见解都需要实证与样本的支持，所以，我们必须常年行迹于山野、村寨，唯有不疲者方能体会。30余年来，本人始终沿着这一方向努力不懈。本书所辑录的28篇论文是本人多年实践、探索的结晶，拥为敝帚，乃不乏潜心投入。

感谢一路上指导、扶持我的老师以及帮助、支持我的同仁。这本满是音标符号的集子能够出版，还要感谢耐心的编辑认真的付出。文章仅一家之言，疏陋之处在所难免，能得教于海内方家则幸莫大焉。

伍巍
2010年12月18日
草于广州暨南园

目 录

总 序	1
自 序	1

第一编 音韵研究

汉语“-儿”尾纵谈	3
合肥话“-i”、“-y”音节声韵母前化探讨	12
粤语语音特点的讨论	17
粤语勾漏方言的语音特点	27
广州话溪母字读音研究	37
广州音系舌根声母 kw、k'w 讨论	42
一百年来广州话遇摄韵母读音演变研究	47
一百年来广州话止摄韵母读音演变研究	53
粤北土话小称语音形式研究	60
北京话两字连读的声调连线规律	67
论江淮官话入声发展演变的轨迹	77
中古全浊声母为不送气音的研究	86

第二编 词汇研究

“是”的任指义研究	101
黄姑方言中指示代词“乃”的研究	108
析“築”	115
浅析广州粤语的“话”、“讲”、“倾”	124
粤语动词“食”、“喫”研究	129
粤北龙归土话的小称研究	132
徽州方言的小称研究	138
广东客家方言词语中的文化内涵	147

第三编 语法研究

汉语方言“正偏”结构探讨.....	155
现代汉语节律的功能 ——谈口语中的“重音”与“断连”	162
湘南蓝山土市话的处置式	172
南方方言性别标记虚化现象研究	178

第四编 方言区划研究

论桂南平话的粤语系属	195
信都土话的系属研究	205
广东省的汉语方言（广东省汉语方言地图稿）	213
粤语的内部分区	223

第一编

音 韵 研 究

汉语“-儿”尾纵谈

一、现代北方儿化词的基本特征

儿化词今天在以北京为代表的北方方言中十分普遍。不妨试举几例：

名词

小孩儿

北京	小孩儿	çiau ²¹⁴⁻²¹ xair ³⁵
济南	小孩儿	çio ⁵⁵ xer ⁴²
沈阳	小嘎儿	çiau ²¹³⁻²¹ kar ³³
成都	小娃儿	çiau ⁵³ uar ³¹

花

北京	花儿	xuar ⁵⁵
沈阳	花儿	xuar ³³

量词

(一小) 片

北京	(一小) 片儿	p'iar ⁵¹
----	---------	---------------------

(一) 串

北京	(一) 串儿	ts'uar ⁵¹
昆明	(一) 串儿	ts'uär ¹³
西安	(一) 抓儿	pfar ²¹

代词

这儿

北京	这儿	tsər ⁵¹
西安	这搭儿	tsə ⁵³ · tar
成都	这儿	tsər ⁴⁴
昆明	这点儿	tsɿ ¹³ tiər ⁵³

副词

一起

北京	一块儿	i ³⁵ k'uair ⁵¹
济南	一块儿	i ²¹³ k'uər ²¹

根本

北京	压根儿	ia ⁵¹ kər ⁵⁵
----	-----	------------------------------------

这些儿化词的基本特点有以下五点：

第一，频繁见用于口语，属地道的口语词。

第二，“-儿”在词中已彻底虚化。

第三，“-儿”只作为虚语素附着于中心语素，在音节组合上不是音素，只是一个伴随性的发音动作（翘舌），“-儿”不独立成音节。

第四，常表现“小”、“可爱”、“亲近”等感情色彩，往往有区别词义或词性的作用（如北京话的“水牛儿”不同于“水牛”；名词“花儿” *xuar⁵⁵* 不同于“花儿” *xua⁵⁵ər³⁵*，也不同于动词“花” *xua⁵⁵*）。

第五，儿化范围主要为名词、量词、代词、副词四类，其中以名词居多。

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儿”不独立成音节的词尾读音特点，它是一个语素，但语音形式却包含在被儿化音节之中，没有自己独立的声调。这一形式特点是“-儿”尾区别于“子”、“头”等后位词缀的重要表征，所以，我们将北方话中的“子”、“头”等附加成分称作“词缀”，而将北方儿化词中的“-儿”称作“词尾”。

汉字是以音节为单位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音节，可是汉语儿化中的“-儿”尾却打破了这一束缚。正因为“-儿”尾的这一形式特点，所以儿化词中的“-儿”在某些口语化的文字记录中往往有被自由省略的可能。如“小孩儿”在老舍的《骆驼祥子》（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七—58页作“小孩儿”，而七—64页、十一—85页、十四—121页又作“小孩”；“事儿”在老舍《茶馆》（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原作第一幕中出现六次，其中两处记作“事儿”，其余四处均记作“事”；“花儿”在《骆驼祥子》七—58页、八—74页、十二—103页、十五—136页等处一律皆写作“花”；连接副词“一边儿……一边儿……”在《骆驼祥子》二—14页作“一边……一边儿……”，十一—87页作“一边儿……一边儿……”，而六—50页、九—77页、十五—136页、十六—145页等处均作“一边……一边……”。这些见用率很高，且烂熟于老北京口头的儿化词，在实际口语中是不可能丢掉儿化音的，但文字省略在阅读时并不觉得别扭，因为这些已被儿化透了的儿化词早已在北京口语中形成了固定的读音形式，即使被文字记录忽略的儿化“音彩”，在阅读中仍然会为相应的口语习惯所还原。相比那些结构较稳定、带后位词缀成分的词，如“花子” *xua⁵⁵ · tsɿ*（乞丐），“花头” *xua⁵⁵ · tɿou*（花纹；花招），“花儿” *xua⁵⁵ər³⁵*（民间歌曲）等词中自成音节的后附加成分因读音相对独立，所以见于文字记录时一般不能轻易省略。为了说明的方便，以下章节拟沿习惯，将此类词称作“儿化词”。

二、“儿”的虚化

“儿”在历史汉语语词中最初没有虚化的义项，《说文·儿部》里的“儿，孺子也”，完全为实词。“儿”作为语素也如此，这在东汉及东汉以前的文献中十分明显，如：

婴儿（幼儿） 《孙子·地行》：“视卒如婴儿。”

歌儿（歌童） 《史记·高祖纪》：“高祖所教歌儿百二十人，皆令为吹乐。”

弄儿（供人玩弄的幼童）

《汉书·金日磾传》：“日磾子二人皆爱，为帝弄儿，常在旁侧。”

黄口儿（幼儿） 《汉乐府·东门行》：“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

东汉以后，“儿”不再局限“孺子”一义，开始用于泛指，因为见用频率的相对提高，词义渐有虚化的趋向。如：

啄木儿（啄木鸟） 蔡邕《短人赋》：“冠戴胜兮啄木儿。”

雄儿（英雄好汉） 《魏晋民谣·并州歌》：“雄儿田兰为报仇。”

行客儿（行路人） 《北朝乐府·折杨柳歌辞》：“蹀座吹长笛，愁杀行客儿。”

虏家儿（北方民族人）、汉儿（汉族人）

《北朝乐府·折杨柳歌辞》：“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

偷儿（小偷） 《太平御览》七〇八载晋裴启《语林》：“偷儿，石染青毡是我家旧物，可特置否？”

很显然，这时的“儿”已有了一定的词缀意味。

迄今为止，我们发现的“儿”完全虚化的最早材料，是南朝沈约的诗作《领边绣》：“萦丝飞凤子，结缕坐花儿。”这是一首描写女孩子巧手绣花的诗，诗中以“凤子”与“花儿”对举，语义十分明显。“子”在前秦时期已有用作词缀的例证，如“拜请百福，赐我喜子”（“喜子”为小蜘蛛，俗为喜征）（王力，1980）。精通声律、根据当时的语言实际著作过《四声谱》的沈约，在这一联对仗工整、语言流畅自然的诗句中，以“凤子”与“花儿”对举，不可能是脱离当时口语实际的生造，因此，“儿”完全虚化的用法最迟当不下于南北朝时期，只是此一时期典型的文献例证并不多，无法得出当时的附加成分“儿”已普遍用于口语词词缀的结论。

三、汉语“-儿”缀的成熟及唐代的“-儿”缀

唐代，儿附加词见于汉语口语文献的例子变得寻常起来，如：

鲤鱼儿 《景龙童谣》：“牵来河里饮，踏杀鲤鱼儿。”

獮儿 《敦煌曲子词·倾杯乐》：“爱引獮儿鸚鵡戏。”

《敦煌变文集·父母恩重经讲经文》：“五五相随骑竹马，三三结伴趁獮儿。”

雀儿 《燕子赋》：“燕子语雀儿”，又“雀儿语燕子”。

黑厮儿 《燕子赋》：“如今会遭夜莽赤推，总是者（这）黑厮儿作祖。”

面儿 《丑女缘起》：“轻慢圣贤之业，感得面儿丑陋。”

鸭儿 《敦煌变文集·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鸭儿水上学浮沉。”

丈夫儿 《维摩诘经讲经文》：“共伊彼此是丈夫儿。”

鼠儿 《人心不可识》：“藉猫搦鼠儿。”

童子儿 《左街僧录大师压坐文》：“设使身成童子儿，年登七八岁。”

火蛾儿 冯贊《云仙杂记·洛阳岁节》：“洛阳人家……正月十五造火蛾儿，食玉梁糕。”

因为口语的影响，当时文人作品中的儿附加词也变得频繁起来，如：

- 鱼 儿 杜甫《水槛遣心》：“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
杜牧《鹭鸶》：“群捕鱼儿溪影中。”
- 鹅 儿 杜甫《舟前小鹅儿》：“鹅儿黄似酒，对酒爱新鹅。”
韩偓《深院》：“鹅儿唼喋梔黄嘴，凤子轻盈腻粉腰。”
- 雁 儿 杜甫《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舟》：“雁儿争水马，燕子逐樯乌。”
王维《戏题示萧氏甥》：“芦笋穿荷叶，菱花冒雁儿。”
- 百舌儿 卢仝《悲新年》：“病客愁听百舌儿。”
- 黄莺儿 金昌绪《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
- 水鸭儿 李群玉《钓鱼》：“惊起沙滩水鸭儿。”
- 朱 儿 陆龟蒙《积怀华阳润卿博士》：“清斋若见茅司命，乞取朱儿十二斤。”
皮日休《药名联句》：“朱儿应作粉，云母讵成灰。”
- 獨 儿 王涯《宫词》：“白雪獨儿拂地行。”
- 凤凰儿 施肩吾《抛缠头词》：“一抱红罗分不足，参差裂破凤凰儿。”

归纳唐代的上述儿附加词例证，同样可以得出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这些词应属当时的口语，见用频率相当高。

第二，从这些儿附加词的词义及它们在格律诗词里与“子”缀词的对应中（如杜甫诗“鱼儿”对“燕子”、“雁儿”对“燕子”，韩偓诗“鹅儿”对“凤子”）可以证明，这些儿附加词与“子”缀词的结构完全相同，“儿”确已彻底虚化，成为纯粹的附加成分。

第三，这些儿附加词寓有一定的感情意味，如“獨儿”、“鱼儿”、“黃莺儿”实带有小而可爱的意味，杜甫“鹅儿黄似酒”一诗诗题着意名为“舟前小鹅儿”，表示小的意味不言自明。

第四，某些儿附加词当时已有区别词义与词性的作用，如“朱儿”（丹砂——名词）不同于形容词“朱”（杜甫《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朱门酒肉臭”，“朱”为形容词）；“火蛾儿”（当时一种应节的纸帛彩灯制品）不同于“火蛾”（扑火飞蛾，见韩偓《火蛾》）。

根据以上几个特征，能否认定“-儿”尾的形成呢？回答是否定的。凭借唐代儿附加词的上述几个特征，只能肯定这些儿附加词与“子”缀词在构词形式上有共同之处，两者均为“实语素+虚语素”，尚无法认定作为虚语素的“儿”与词缀“子”在是否能单独成音节的读音特点上有什么不同。因为在上述格律诗的工整对句中，既然“子”居一个音节，与之对应的“儿”当然也居一个音节。这一严格的声律形式对应，是唐代格律诗的规范要求，据此我们无法否认“儿”在这些诗词中独立成音节的基本事实。

此外，作为附加成分的“儿”在唐代文献中一般只局限于名词，并未扩大到代词、量词和副词，这也是“儿”在走向词尾的发展过程中并未完全成熟的标志。既然唐代的附加成分“儿”独立成音节，那么它与附加成分“子”一样，也是词缀。

上列事实说明，唐代的附加成分“儿”已彻底虚化为一个词缀，并频繁地见用于当时的口语。接着要讨论的问题是，作为词缀的“儿”在当时的语音形式上的表现。唐写本《切韵残卷》五支：“儿，汝移反”；《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故宫本）五支：“儿，如移切”，两切实则一音。唐代王维《戏题萧氏甥》诗“池、诗、之、儿、欺”通押；李洞《赠之惠大师》诗“时、师、棋、儿、眉”通押；杜甫《咏怀古迹》诗“悲、师、时、思、疑”通押。

可见当时止摄“支”、“脂”、“之”诸韵已合流，以此判断，当时的“儿”应当读为 ŋi 。作为词缀形式的“儿 ŋi ”在今天的现代汉语方言中仍保留鲜活的例证，如：

旌德徽语“-儿”缀（独立成音节的 - ŋi 调值为轻声）：

伢儿 $\text{ŋɔ}^{42-22}\text{ŋi}^2$ (小孩儿)	姐儿 $\text{tɔia}^{213-21}\text{ŋi}^4$
奶儿 $\text{la}^{213-21}\text{ŋi}^4$ (乳房)	八哥儿 $\text{pa}^5\text{ko}^{334-55}\text{ŋi}^5$
黄蚁儿 $\text{uo}^{42}\text{ŋɛ}^{213-22}\text{ŋi}^2$ (蚂蚁)	画眉儿 $\text{xuɔ}^5\text{mi}^{42}\text{ŋi}^2$
啄鸡儿 $\text{tso}^5\text{tsi}^{334-55}\text{ŋi}^5$ (斑鸠)	嬉蝶儿 $\text{sɿ}^{213-21}\text{sɿ}^{213-11}\text{ŋi}^4$ (蜘蛛)
一下儿 $\text{i}^5\text{xɔ}^{213-55}\text{ŋi}^5$ (一会儿)	一 * 滴个儿 $\text{i}^{5-3}\text{ti}^5\text{ka}^5\text{ŋi}^5$ (极少的一点儿)

高州粤语“-儿”缀：

鸭儿 $\text{ap}^3\text{ŋi}^{55}$ (小鸭)	鹅儿 $\text{ŋɔ}^{11}\text{ŋi}^{55}$ (小鹅)
狗儿 $\text{kəu}^{35}\text{ŋi}^{55}$ (小狗)	鱼儿 $\text{ŋi}^{11}\text{ŋi}^{55}$ (小鱼)
杯儿 $\text{pui}^{55}\text{ŋi}^{55}$ (小杯)	兔儿 $\text{t'ou}^{33}\text{ŋi}^{55}$ (小兔)

可以推断，唐代“儿”缀的语音形式应该与此相像。

四、汉语“-儿”尾的形成及宋代的“-儿”尾

自宋代起，儿附加词运用范围明显扩大，翻开宋代的话本、杂记，该类词语比比皆是，频繁出现于当时的口语。如：

女孩儿	眼儿 (眼睛)	屋儿	铃儿	笠儿	担儿	轿儿	
《话本选·碾玉观音》							
包儿	门儿	主儿	朱三老儿				《话本选·错斩崔宁》
诗儿	曲儿	词儿	简帖儿	水滴儿	金篦儿	盘儿	帘儿 篓儿
环儿	餽蚀儿	小厮儿	纸裹儿	纸包儿			《话本选·简帖和尚》
发儿	额儿	眉儿	眼儿	鼻儿	腮儿	口儿	胸儿 奶儿
镜儿	磐儿	嘴儿	筐儿	手儿	腰儿	脚儿	带背儿 罐儿
包儿	盏儿	毛儿	竿儿	架儿	牌儿	盒儿	
《话本选·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水晶皂儿	匣儿	伞儿	鼓儿	瓜儿	柿膏儿	笑靥儿 (一种食品)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背心儿	香袋儿	蹄儿	枣儿	梳儿			吴自牧《梦粱录》

这一时期的量词也有大量儿化的例证：

些儿	李煜《一斛珠》：“晓妆初过，沈檀轻注些儿个。”
	宋无名诗《御街行》：“雁儿略住，听我些儿事。”
些子儿	陈师道《后山诗话》引卢多逊《新月》：“谁家玉匣开新镜，露出清光些子儿。”
多儿	邵雍《首尾吟》：“天听虽高只些子，人情想去没多儿。”
两口儿	《话本选·错斩崔宁》
半啜儿	一包儿 半点儿 《话本选·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频繁儿化的还有口语中的一些常用副词：

- | | |
|-----|-------------------------------------|
| 一垛儿 | 《话本选·错斩崔宁》：“把这十五贯钱一垛儿堆在刘官人脚后面。” |
| 一块儿 | 《话本选·错斩崔宁》：“崔宁也被扯去，和父母四个一块儿做鬼去了。” |
| 一灵儿 | 《话本选·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今番得了阳和之气，一灵儿又醒将转来。” |
| 霎儿 | 李清照《行香子》：“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 |

由此可见，汉语儿化现象在宋代已完全走向成熟。

翻检宋话本的几篇代表作，在同一篇故事，甚至同一页文字记录中，儿化词经常出现省写与非省写两种形式的任意交替，如：

轿儿（1见）——轿（3见）	《话本选·碾玉观音》
朱三老儿（3见）——朱三老（5见）	《话本选·错斩崔宁》
简帖儿（9见）——简帖（2见）	《话本选·简帖和尚》
诗儿（1见）——诗（7见）	《话本选·简帖和尚》
词儿（1见）——词（4见）	《话本选·简帖和尚》
馉饳儿（6见）——馉饳（2见）	《话本选·简帖和尚》
帘儿（1见）——帘（1见）	《话本选·简帖和尚》
一包儿（1见）——一包（3见）	《话本选·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罐儿（1见）——罐（2见）	《话本选·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这一省略现象在宋代话本中十分常见，与我们前面介绍的在老舍作品中遇到的情况相同，此类情况却较少发生在同一时期话本的“子”缀词中。这一现象说明宋代的“儿”在当时的口语儿化词中已经虚化透了，因高频率的使用，在读音形式上已不再独立成音节，而化为被儿化音节的一个音尾。正因为“-儿”尾在读音上不足一个音节，才容易被书写记录忽视；也正因为这些儿化词已被当时的口语相对固定，所以，人们在阅读中很容易根据语感的习惯作口语还原。像“馉饳儿”（犹如今天北京话的“水饺儿”）这类地道的小食名称在当时的民间口语中不可能不儿化，否则当时文本记录中的这一频繁的省略现象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

接着要讨论的问题是，宋代的“-儿”尾在语音形式上的表现。宋本《广韵》五支注“脂之同用”，“儿，汝移切”，此时“儿”单字的读音与唐代相同，应为 ŋi ，这也是当前学界的共识。儿化词的“词尾”在读音上不同于“词缀”，它不具备一个完整的音节，没有独立的声调，只是被儿化音节发音的一个“音彩”。宋代的单字“儿 ŋi ”声母与韵母各是一个音素，那么宋代不自成音节的“儿 ŋi ”究竟以何种语音形式附着于被儿化音节呢？假定当时“-儿”尾前被儿化音节的声母为 A，韵母为 B，“儿”字的声母为 a，韵母为 b，那么宋代儿化词音节的结构不再可能像唐代那样为“AB—ab”（词根 + 词缀），而只可能是“AB—a”或“AB—b”。口语连读中的一般规律显示，由“AB”一下越过“a”直接连读成“AB—b”的可能性不是太大，语言实践中也很少有这样的例子。不排除在近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演变过程中，某些方言“儿”的声母逐渐被声化元音替代（如北京话），有些方言中“儿”的韵母被韵化辅音替代或脱落（如温州话），最终使“儿”的声母、韵母合而为一，这样，儿化词的音节结构也就无所谓“AB—a”与“AB—b”的形式之分了。具体到宋代的儿化词，不存在“儿”音节声母的消失，其儿化音节的结构形

式应当为“AB—a”格式，即“AB—ŋi”（或“AB—n”）。

这一推论可以在今天的相关方言平面得到验证。安徽休宁徽语与广东信宜粤语“儿”字均读为ŋi，两个方言的儿化音节结构如下：

休宁徽语：

虾	xɔ ³³	(字音)	虾儿	xɔŋ ³³⁻²⁴	(口语)
鸟	ŋio ²⁴	(字音)	鸟儿	tian ²⁴	(口语)
花(花钱)	xu:a ³³	(动词)	花儿	xuaŋ ³³⁻²⁴	(名词)
圈(一圈)	tç:y:a ³³	(量词)	圈儿	tç:yəŋ ³³⁻²⁴	(小圈儿，名词)
刀	tʂ ³³	(大刀)	刀儿	ten ³³⁻²⁴	(小刀儿)
一下儿(一会儿，短时)	je ²¹³⁻³³	xɔŋ ³²⁴⁻²⁴			
一点儿(少量)	je ²¹³⁻³³	tin ⁴²⁻³⁵			

信宜粤语：

兔	t'u ³³	(字音)	细兔儿	t'ei ³³ t'un ³⁵	(小兔子)
鼠	ʃy ²⁴	(字音)	米鼠儿	mɛi ²⁴ ſyn ³⁵	(小老鼠)
猪	tʃy ⁵⁵	(大猪)	猪儿	tʃyn ⁵⁵⁻³⁵	(小猪)
锣	lɔ ²¹	(大锣)	锣儿	lɔŋ ²¹⁻³⁵	(小锣)
锁	tø ³⁵	(大锁)	锁儿	tøŋ ³⁵	(小铜锁)
妇乸	fu ²⁴⁻⁴² na ²⁴	(女人通称)	妇乸儿	fu ²⁴⁻⁴² nan ²⁴⁻³⁵	(女人鄙称)

此外像浙江的义乌、浦江等方言，今天的儿化词词尾均作“-n”，皆可印证中古汉语“-儿”尾的一般规律，说明以上的推论有一定的事实依据。

五、元代的“-儿”尾

翻开元代的杂剧或话本，可以发现儿化词在北方的口语文献中数量骤增，应用更加频繁，似乎达到饱和的程度。以王实甫《西厢记》三本二折为例，儿化词如下：

粉蝶儿 简帖儿 梯儿 小孩儿 角门儿 性儿 隔墙儿 心儿 好意儿

争些儿 棍儿 消息儿 甜话儿 道儿 心肠儿 诗句儿 行儿 头儿

自金代起，北方汉语的代词亦走进儿化的行列。如：

那些儿(那样) 难为个侍婢，举止皆奇妙，那些儿鵲鸽，那些儿掉。

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卷一

这搭儿(这儿) 恰才这搭儿，单于王使命，呼唤俺那昭君姓名。

元杂剧《汉宫秋》第四折

那答儿(那里) 正打当街过，见吊个花碌碌纸榜，不似那答儿闹穰穰人多。

杜仁杰《般涉调·耍孩儿》

那些儿(那些) 湖山佳处那些儿，恰到轻寒微雨时。

卢挚《双调·水仙子》

是搭儿(这里) 一枕葫芦架，几行垂杨树，是搭儿快活闲住处。

马致远《双调·清江引》

元代的儿化词之所以如此丰富，不外有两个原因：

第一，当时的北方官话系统已基本形成，广大中原地带的语言已基本统一，这给儿化词的通行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流通空间；第二，北方统治者的南下，促使中原地带的语言发生巨大的变化，舌尖元音的产生与发展使“儿”朝着更有利于发儿化音的方向发展。

元代著名的北曲韵书《中原音韵》将“儿”归为“支思”韵，与“齐微”分而不混。查阅元代相关作品的韵脚，与“儿”通押的字完全如此，试举几例：

卢挚《前调·寒食新野道中》：（参）差、茨、丝、儿、枝、时、诗

卢挚《双调·水仙子·西湖》：儿、时、事、丝、脂、词、施；
儿、时、寺、诗、姿、子、施

乔吉《前调·怨风情》：枝、匙、事、儿、雌、死、思

无名氏《越调·小桃红·别忆》：词、事、自、思、志、似、儿

此一时期“儿”与“齐微”韵通押的例子我们没有发现，由此可以确凿地说明元代“儿”的韵母已完全为舌尖元音。根据上列的“儿”与“支思”韵通押的例证来观察，元代的“儿”尚不具备像今天北方话的“ σ ”那样卷舌的特征。根据罗常培先生的研究，中古日母字声母在《中原音韵》时代为舌叶音 z （罗常培，1932），那么元代“儿”字的读音当为“ $z\chi$ ”，其韵母是一个稍稍偏前的舌尖后元音。大家知道，辅音“ z ”与元音“ χ ”是两个发音位置相近的共生音素，发元音“ χ ”稍带摩擦就成了辅音“ z ”；发“ z ”稍稍放松就成了“ χ ”。按便捷的口语发音规律，例如，今天北京话的“日 $z\chi$ ”，实际发音要么作自成音节的“ z ”，要么作“ χ ”，两者与“ $z\chi$ ”并不形成音位对立。相比之下，将“ $z\chi$ ”发为元音“ χ ”更省力，所以罗常培进一步认为金元时代的“儿”其实是一个“声化元音”（罗常培，1956）。如此推理，元代“儿”尾的语音形式就是一个稍稍偏前的舌尖后元音“- χ ”，其儿化音节的语音结构当为“AB- χ ”。

六、汉语儿尾“-r”的形成过程

汉语儿化现象发展到元代，可以说达到了极盛时期，从相关的口语材料来考察，此后汉语北方话的儿化词有逐渐减少的趋势，但是“-儿”尾的读音并未就此定型，仍处在进一步的发展变化之中。

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北方话音系，今天的一组翘舌声母为舌尖后辅音，如果罗常培先生等人将元代的日母字声母拟订为舌叶音“ z ”符合当时的语音实际，那么明清以来，以北京为代表的北方话的翘舌声母的发音位置发生了适度的后移，同时跟着后移的当然包括与浊擦音“ z ”共生的舌尖元音“ χ ”。“儿”中古为止摄开口日母字，韵母为单元音，与其他摄的日母字相比，“儿”不存在介音或韵尾的牵制，也就是说，止摄开口日母字与“然”、“让”等非止摄字相比有更自由的音变空间，这也是今天北京话的“儿”、“耳”、“二”等字变得不像其他日母字仍保留翘舌声母的原因所在。在“儿”的声母与韵母同时发生后移之后，“儿”音节就应当是“ $z\chi$ ”。同样的道理，在口语实际发音中将“ $z\chi$ ”读作一个较松的“ χ ”在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北方话音系中并不产生音位对立。这是近代北方话“儿”音变的第一步，“儿”可读为自成音节的舌尖后元音“ χ ”。